

李汝珍 师友年

李明友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李
鴻
珍
師
友
年



李明友 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汝珍师友年谱 / 李明友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506-0147-5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汝珍 (约1763~约1830) — 年谱②凌廷堪 (1755~1809) — 年谱③吴振勃 (1770~1847) — 年谱④许乔林 (1775~1852) — 年谱⑤许桂林 (1779~1822) — 年谱 IV. ①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5099号

书 名 李汝珍师友年谱

著 者 李明友

责任编辑 汪允普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

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:212404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445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147-5

定 价 55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1—87871135)

序

我幼年就知道《镜花缘》是当地乡亲的作品，那还是沦陷时期，看的是伪满东北大中书局的版本，然后又零星地知道鲁迅、郑振铎、胡适、周恩来等先贤对它都有过贴切的论述，更感到那是海州乡土的一种骄傲。后来胡适、孙佳讯、吴鲁星诸先生致力于《镜花缘》作者的探讨，可惜那时我还不太懂事，很少关注。建国后按照当代人对小说的标准重新排序，出来了四大古典名著之说，《镜花缘》一下子由较前的位置跌落，然而正如许多专家所言，如果将中国古典小说搜寻前十位的话，绝不会缺少了《镜花缘》！

《镜花缘》是一部空前绝后非常奇特的著作，它在主题的选择上一反历史传统，将才子佳人易为巾帼须眉，将男恩女爱易为海外述奇；在伸张女权方面千古独步，语多惊人。更为鲜见的是该书出版不久，即遭盗版之扰和版权之争，以致使孙佳讯先生终生为之奋争，得以恢复历史真貌。遗憾的是李汝珍一生几乎没有做官，关于他的身世至今我们仍知道的很少。他能诗善画，但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得罪了许乔林，以至于在出版《胸海诗存》时借故一首不收；他

的画始终也未被发现。现在连他的故乡与晚年归宿都无从考证，甚至拿不出一部完整的年谱，这种状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，不能不说是地方史话上的巨大憾事。

关于李汝珍的年谱，上个世纪初吴鲁星先生曾作过探索，我见过他亲笔撰写的稿本，比较简略。他那时便已经感到资料匮乏捉襟见肘。然后李洪甫、张传藻、许厚文诸先生也都在这方面做过努力，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也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原始材料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采用了与其师友联合作谱的办法。这次李明友先生也是被迫沿用了这种方式，并把它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较为完善的李汝珍师友合谱。这样的写法虽出于无奈，但也有它的好处。它可以尽兴展示李汝珍酝酿与创作《镜花缘》前后的社会环境和其师友关系，展示《镜花缘》成书得益于师友相助和影响的轨迹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当年《镜花缘》刚刚问世，便盛传为许氏兄弟所作并非完全无风起浪。我们这一代人应属古典名著考证的最后收容队，当我们终归沉寂之后，除非特殊机缘，已经很难再有多少子遗了。在《镜花缘》研究会成立之初，我曾经和许家后人多次接触，也曾亲往埠苴许家老莹探访最后的看莹人，夏兴仁同志还前往李汝珍的故乡大兴县访问，均未获任何新知，反而增添了更多的疑云，如李汝珍是扬州人并老死扬州之说，李汝珍晚年生活窘困曾由故乡写信到妻家要求资助等。这些情况言者凿凿，听者一头雾水；加上近百年来屡经战乱，一些遗存大多烟消云散，所以说今天能够看到这么一部年谱多么的不容易。我认真拜读了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群贤毕至的地方和时代，深深体会到一部文学巨著的问世该多么机缘凑巧，它倾注了多少无名英雄的心血啊！

李明友先生一生从事文学创作，并对家乡的文化遗产付予更多的关心，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的创作，实际是在石田上的耕耘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，他终于把书稿拿出来了，这虽然还不是最为完备的年谱，但确是迄今为止较为丰富的一部，它

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会,并且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新知。诸如《音学臆说》的提出,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。我一边翻阅年谱,一边为他的努力暗自叫好。

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的问世,还为与《镜花缘》相关人士的来龙去脉提供一份较为细致的信史。过去我们读《胸海诗存》,对其中大多数作者的身世及与李汝珍、李汝珍亲友的关系亲疏尚不太了解,有此一册按图索骥,很容易便能搜索到。同时近年来海属地区对《镜花缘》及其作者的研究略显停滞,几乎没有突破性的进展,其原由大抵与原始资料很难再进一步发掘有关。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的问世,给予朋友们很大的启发,证实了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下去,对这部为乡土争光的传世之作继续努力探讨,助其发扬光大,以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。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,无形文化遗产得到全社会的重视。我相信《镜花缘》的研究在新一代乡土爱好者的支持下,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积极参与下,从现在开始,必将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!

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,窃以为年谱对于许多重要诗文的原件没有同时收录是一件憾事。因为其中提到的一些诗文集有的现在就很难见到,若干年后或将湮灭,倒不如附丽于此,为后来者省却许多搜寻的工夫。

彭 云

2010年深秋于鹿镜轩

自序

终于编成这部年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有幸生在板浦古镇，自记事起听得最多、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一辈人讲述的关于《镜花缘》的传说，还有凌廷堪、二许（许乔林、许桂林）、二吴（吴振勃、吴振勳）那些近乎神话般的奇闻轶事了。虽然时隔一百多年，古镇父老每每谈起往事，犹然绘声绘色、如数家珍。况且诸多遗迹尚在，故址犹存。我就读的小学就与“二许”故居毗邻，而我家更与吴家大院（吴振勃故居）一巷之隔，相距数步。抗战期间，板浦曾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，到处断垣残壁，瓦砾成堆，吴家大院亦未能幸免。家中大多数人早已移居外地，只有一对老夫妻留下守护老宅。仅存的三间堂屋中别无他物，从地面到屋梁堆放的全是书籍。两位老人只在近门处留一席之地供起居。每逢春夏晴日，老夫妻忙着翻晒书籍，院中杂花生树，地上摊满书册。其情其景，今日回忆，犹历历在目。

后来一因兴趣爱好，二为工作需要，我与长兄李明发相继撰写了一批关于《镜花缘》研究以及凌廷堪、“二许”、“二吴”的介绍文

章,刊登在《连云港日报》、《苍梧晚报》等报刊上,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特别是在1997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《镜花缘》学术研讨会上,我们提交了三篇论文,承蒙萧相恺老师和王学钧老师厚爱,这三篇论文分别被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9年第4期和2000年第1期刊用,继而分获连云港市1999—200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、二等奖,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。其中我所撰写的《淮楚气息与齐莒风概——〈镜花缘〉成书时代背景研究》被中国人民大学《报刊复印资料》收录。

在此期间,我先后被推举为连云港市《镜花缘》研究会副会长和常务副会长。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少年版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》丛书,约我改写《镜花缘》。市、县有关领导也多次建议我编写一部反映李汝珍如何创作《镜花缘》的电视剧,我思虑再三,始终未敢贸然应命。因为在大量阅读《镜花缘》研究文章和资料的过程中,我发现涉及李汝珍及其文友们的生平活动时,许多文章用以支撑论点的论据不够准确,有的与史料不符,有的张冠李戴,有的根本查不到依据。例如:

有的文章称“凌廷堪初游扬州,有缘受业于江慎修和著名考据家戴震(东原)”。实际上,江永去世时凌廷堪仅六岁,何来扬州受业之说?就是戴震,凌廷堪也无缘见面。凌氏自己所撰的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说得很清楚:“东原先生卒后之六年,廷堪始游京师,洗马大兴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遗书,读而好之。又数年,廷堪同县程君易田复为言先生为学之始末,深惜与先生并世而不获接先生之席也。”因此,凌廷堪自认为是戴震的“私淑弟子”。

李汝珍的妻子是何人,并无史料记载。由于许桂林曾经在文章中称李汝珍为“姊夫”,李汝珍则称许桂林为“内弟”,而二许并无亲姐姐,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李汝珍的妻子是二许的族姐。有的人便考证出了李汝珍的妻子叫许胜,字慧仙,“是才子二许之堂姐、李汝珍的续弦夫人”。许乔林在选编的《胸海诗存》第十五卷录有许胜的诗,并有其小传:“许胜,字慧仙,朱增茂室。”还说:“余编

《胸海诗存》，凡见在者不入。《闺秀》一卷既脱稿，而兄女慧仙一夕卒。录其遗诗，以泪和墨。呜呼！二十年荆布，一霎昙花。”由此可知：许胜是许乔林的堂侄女而不是堂姐，许胜的丈夫是朱增茂而不是李汝珍。许胜卒于道光十一年，年仅二十岁，则生年应为嘉庆十七年。她出生的这一年，李汝珍已经五十岁了。

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；指鹿为马，望文生义；想象丰富，严谨不足。此类讹误在《镜花缘》研究中既不是个别现象，也不是现代才出现的新情况。究其因，多因史料匮乏，检索不易。然而一旦形成文字，见诸报刊，互相转引，以讹传讹，无疑又为后来者平添了重重雾障。我阅读过几位台湾硕士研究生撰写的研究《镜花缘》的毕业论文，发现了许多此类讹误。而大陆一些研究《镜花缘》的学者，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坠入五里雾中。

我曾向王学钧老师谈起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担忧，学钧老师建议我广泛搜集资料，编写一本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，以便同好者比对查阅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因为面对海内外那么多论文和专著中的讹误，谁也无法去一一批评纠正，而对后来者的迷茫与困惑，也决非三五篇考证文字就能说得清楚明白的。况且如果将李汝珍及其师友分别写出专谱，不仅内容易重复，枉费笔墨，读者也难以查阅。而以合谱的形式，将李汝珍及其文友们的有关资料罗列其中，一一注明出处，这样让有心的研究者一册在手，就能分析比对，鉴别真伪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目标确定后，我便着手多方搜集资料，经再三斟酌，确定以李汝珍、凌廷堪、许乔林、许桂林、吴振勃作为《李汝珍师友年谱》的五位谱主。

将李汝珍作为谱主之一，因为他是《镜花缘》的作者，无需多言。至于凌廷堪，虽然张其锦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中列举的凌廷堪受业弟子五十五人中没有李汝珍，但李汝珍自己确认凌廷堪是他的老师。在《李氏音鉴》卷五“第三十三问”中，李汝珍说得很明白：“壬寅之秋，珍随兄佛云宦游胸阳，受业于凌氏廷堪仲子夫子。论文之暇，旁及音韵，受益极多。”因此，凌廷堪作为李汝珍的老师列

为谱主之一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许乔林、许桂林与李汝珍既是亲戚，又是至友。他们相处时间最长，相知亦深，学术上交流频繁。“二许”作为谱主入选，当无疑义。至于吴振勃，既与李汝珍交往密切，又与“二许”相交终生。他留下的一部《筠斋诗录》，收录了吴振勃二十岁至七十七岁所写的 612 首诗，不仅勾勒了吴氏一生的主要活动情况，更能形象地反映古海州特别是板浦地区当时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真情实况，因此也就被选为五位谱主之一。李汝珍的其他文友尚多，不可能悉数列为谱主，但凡能挖掘到的相关资料，亦尽数收入谱中。

在筹备和编写过程中，我不仅潜心研读了五位谱主存世的全部著作，还查阅了清代乾、嘉、道、咸时期许多相关文人、学者的著作特别是诗文集，广泛参阅了有关的史籍、地方志、档案资料等文献，认真吸取了学术界有关李汝珍、凌廷堪等人的研究成果。其中，在书中征引的文献和著作就有 240 多种。花费大量的精力对五位谱主的交游及其作品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，并考证出 250 余名五位谱主作品中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、或只知其字号而不知其名的亲戚与交游者的名讳。为与五位谱主有交往或有关系的人物共计 500 余人分别写出小传或简介，对文献及有关论著所载五位谱主的生平事迹讹误之处作了不少辨证。在以五位谱主的活动、著述及相关事实为主线的基础上，还将五位谱主的亲朋师生、时在海州任职的官员、当时海州地区文人学士的有关事迹以及重要时事酌情载入相关年份，以期通过这些人物更深入地了解五位谱主及其所处的时代。

实际上，整个编写过程更是我深入学习、认真思考，思想水平得到进一步升华和净化的过程。不仅对五位谱主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了解，而且对清代古海州地区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有了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。凌廷堪早岁贫困，自学成才，最终成为乾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、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，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“以礼代理”的学术观点，对中国近、现代史的思想、文化转型产生

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一部奇书,《镜花缘》所蕴含和反映的思想文化内涵尚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挖掘。而发生在道光年间的淮北盐务改制,板浦古镇既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,许乔林更是亲历其事,并且撰写大量著作记述了淮北盐务改制的重要历史进程。所有这些,有的看似已超出了《镜花缘》的研究范围,但却与《镜花缘》的成书背景与思想文化内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更为研究古海州的历史乃至清代乾、嘉、道时期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颇具特色的样本。有感于此,也就乐在其中了。

限于个人水平,本书的疏漏仍所难免,恳切期望专家与读者指正。

李明友

2010年8月写于南京

凡 例

一、本年谱共包括李汝珍及其师凌廷堪,友吴振勃、许乔林、许桂林等五位谱主。

二、本年谱以按年著录并考证五位谱主的活动、著述及相关事实为重点,五位谱主的亲朋师生、时在海州任职的官员、当时海州地区文人学士的有关事迹以及重要时事也酌情载入。

三、本年谱按年著录五位谱主的事迹、交友与作品时,凡季、月、日可考者,一般列于前;凡季、月、日不明者,一般列于后。

四、本年谱文字力求简明扼要,辑录引文尽量从简,均标明出处,以备检索。

五、本年谱引用五位谱主的作品时,一般只视谱文所需,摘引相关部分;凡五位谱主与他人他事有关的内容,亦仅作摘录;极少数情况,视其需要,全文照录。节录引文,如省略中间部分,其省略部分加省略号,如省略首尾,则不加标记。

六、本年谱所记岁次,以清代纪年、干支和公历年次并列;月、日皆采用夏历,用汉字表示;少数重要的时间(如人物生卒年月

日),在农历月、日后加括号注出公历月、日,用阿拉伯数字表示。

七、本年谱凡有考证、补充、评述、辨误等项内容,皆以按语形式分别置于诸条目下。

八、本年谱中出现的人物,凡生活在清代并生平可考者,均写有小传或简介,一般见于在谱中初次出现的谱文按语中,并于谱末附有人名索引,以供检索。

九、本年谱采用规范简化字,凡异体字均加厘定。对于个别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专用字,为避免产生歧义,仍一律依旧。

十、本年谱所引文献资料,在摘录或全录时,为保持原著面貌,未作任何改动。

十一、本年谱因某种需要,在引文中增加说明字句时,均用方括号括入,以与原著按、注等相区别。

目 录

序(彭云)	(1)
自 序	(4)
凡 例	(9)
李汝珍师友年谱	(1)
附录一 征引文献与书目	(515)
附录二 人名索引	(526)
后 记	(555)

李汝珍师友年谱

乾隆二十二年丁丑(1757) 凌廷堪一岁

八月二十日巳时,凌廷堪生于海州板浦场寓宅。

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巳时,先生生于海州之板浦场寓宅。(张其锦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乾隆二十二年谱)

青龙在涪滩之岁,廷堪生二十年矣。日躔寿星,月离觜觿,吾降值焉。(凌廷堪《二十生日作歌七首并序》,《校礼堂诗集》卷一《丙申》)

乾隆四十四年,岁在屠维大渊献,廷堪春秋二十有三。(凌廷堪《辨志赋并序》,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)

按:“涪滩之岁”,据《尔雅·释天》,为太岁在申之年,依乾隆间纪年干支及凌氏生平,当系乾隆四十一年丙申(1776),而“日躔寿星,月离觜觿”,即八月二十日。是年凌廷堪二十岁,据此上推二十年,则凌廷堪生于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八月二十日。“屠维大渊

献”，为己亥年，即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。是年凌廷堪二十三岁，上推二十三年，则凌廷堪生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。

关于凌廷堪的生年，历来有二说：一说认为凌氏生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享年五十五岁，此说以阮元为代表，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海州文献录》等承之；另一说认为凌氏生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享年五十三岁，此说以张其锦为代表，《清史稿》等承之。孰是孰非，长期未得定论。而《校礼堂文集》、《校礼堂诗集》中有大量凌廷堪关于自己生年的记述，可推算出其生年确为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。

板浦场，清代淮北三大盐场之一。此处实际指板浦镇。板浦镇建于隋唐时期，清代隶属于海州，民国元年始设灌云县，为县治所在。建国后为灌云县属镇，2010年划归连云港市海州区。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卷第十四《建置考》云：“板铺镇，州东四十里，有盐厂八十一总灶丁、运判及板浦场盐大使署在焉。”正因为当时两淮盐运使司海州分司署及板浦场盐大使署均驻板浦，致使板浦镇以盐闻名于世，故清代著述中多以板浦场指代板浦镇。

廷堪，字次仲，又字仲子，学者称仲子先生，安徽歙县人。

先生姓凌氏，讳廷堪，字次仲，一字仲子。江南徽州府歙县九都七图人。（张其锦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卷一）

凌廷堪，字次仲，学者称仲子先生，歙县人。父文焜，业贾于海州，遂家焉。廷堪生于海州，六岁而孤。（许乔林《海州文献录》卷十一《人物·凌廷堪》）

外兄凌仲子先生世居海州之板浦，以歙县取京兆。（许乔林《弇榆山房笔谈》）

按：凌廷堪虽然生于海州板浦，但从其多次参加乡、会试仍以歙县籍应考来看，并未占籍海州，仍应是安徽歙县人。清代对客籍人入当地籍，有明确的规定。《清史稿》卷一百二十《食货·户口》云：“凡民之著籍，其别有四：曰民籍；曰军籍，亦称卫籍；曰商籍；

曰灶籍。其经理之也，必察其祖籍。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，准入籍出仕，令声明祖籍回避。”凌廷堪家境贫穷，在板浦无田产。其父去世后，一直停柩未葬，十八年后凌氏兄弟才奉先君灵柩归葬于歙。可见凌廷堪因种种原由，并未占籍海州。其籍贯仍为安徽歙县。

九月，章洄生于海州板浦场。

君讳洄，字宁叔，又字酌亭，姓章氏，绩溪人也。……曾大父某，大父某，皆行贾海州之板浦场，而君遂生于是焉。……父某公歿数月，君始诞降。（凌廷堪《章酌亭墓志铭》，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三十五）

亡友章洄，字酌亭，绩溪人，流寓海州之板浦场。与仆同庚而小一月，少共砚席，交谊最深。（凌廷堪《与阮伯元阁学论〈画舫录〉书》，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十三）

按：章洄（1757—1786），字宁叔，又字酌亭，号小浦，安徽绩溪人。生于海州板浦，年仅三十岁以疾卒，葬于龙苴（今江苏灌云县龙苴镇）。著有《酌亭遗稿》。许乔林《奔榆山房笔谭》称：“章小浦以郁洲山人为师，与凌仲子、程时斋及先兄为友，故诗有矩度。”

是年，李永书任海州知州。（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卷第四《职官一》）

按：李永书（1706—1774），字绶远，号芳园，直隶河间（今河北省河间市）人。拔贡生。乾隆初年官福建晋江、江苏常熟知县，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知海州。后迁苏州府，擢苏松太道，官至江苏按察使。

乾隆二十三年戊寅（1758） 凌廷堪二岁

十月，漕运总督杨锡绂巡视海州期间，作诗四首。